# 冬学与山西根据地乡村新权力阶层的生成

郭夏云

（太原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摘　要：**在以往宏大的革命叙事背景的视角下，根据地新权力阶层长期在研究者的视阈中失语。作为根据地乡村新的有权阶层，冬学为他们提供了革命思想启蒙、觉醒、成长的环境。乡村新权力阶层的形成，推动了根据地政治生态的重构，使中共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组织真空，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干部储备。

**关键词：**冬学；山西根据地；乡村社会；权力阶层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6)01－0117－07

1937 至 1945 年，是山西根据地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随着冬学的逐步开展和深入，其社会教化和政治教化的功能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化教育本身。冬学教育不仅培养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意识，而且推动了乡村社会新权力阶层的崛起。新权力阶层是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培养起来的一批乡村基层干部。与传统乡村精英相比，他们在生成方式上不是依靠经济资源、社会名望等传统因素，而是通过冬学这一民众教育的形式完成的。借助冬学特有的政治资源和良好的政治出身，他们成长为根据地社会新的权力阶层。

## 一、抗战初期山西乡村社会与冬学的开展

抗战初期的山西乡村，“兵燹之后的荒凉景象，支配了这整个地区，一切都是无秩序、破坏和崩溃。”[1]47“由于受到旧有势力与外来侵略者的双重压迫，比其他地方显得更为落后。人民没有斗争经验，文化闭塞，造成了政治相当的守旧。一般的民众，对于社会改革，表现隔膜与冷淡，富于农业社会所特有的保守观念。”[1]97而传统乡村家族和村落的重叠，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倾向。费正清在 20 世纪 40 年代曾有类似的描述：“从社会角度来看，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各个世系）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种某些祖传土地为生。”[2]农民的地域观念、家族观念根深蒂固。根据地新政权建立后，地主势力虽然受到削弱，但旧的统治的影响仍旧束缚着乡村民众，许多人“在瞻前顾后地观望形势，畏首畏尾，犹豫不决，表现着一副怯懦怕事的神情。有时对于已经卸掉的枷锁，似乎还有点恋恋不舍，对于已经减去的剥削，也似乎仍有无限留恋，表现于心不安或十分的不惯”[3]。对于一般乡村干部，许多人不安心工作甚至有些干部提出要回家参加劳动。总之，民众缺乏对新政权的心理认同。为了帮助农民“换脑筋”，形成对新政权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利用乡村中普遍存在的冬书房，对民众开展了行之有效的冬学教育。

**收稿日期：**2015－10－16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6.01.0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5YJAZH018）

**作者简介：**郭夏云（1973—），女，山西阳泉人，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E-mail：guoxiayun1998@163.com

冬学一词最早出自宋代陆游的《剑南诗稿·秋日郊居》中,“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其自注为“农家十月,乃谴子弟入学,谓之冬学。”[4]抗战之前,阎锡山政府在山西各乡村创办了以识字为主的冬书房,但因“识字班不识字”以及教员的不良作风等原因,给民众留下的印象非常恶劣。对普通民众而言,“识字与否”既不能让他们“成龙成虎”,还会耽误生产和许多事情,而且“坐在房子里念书,是个别扭的事情”。总之,上冬学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5],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更加不感兴趣[6]。为“给群众以抗战的民族解放的教育,在教育工作上来提高群众抗战的认识与热忱,以加强群众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7]2,中国共产党把农村中原有的冬书房改造成为新冬学,“造成广大群众自己学习的运动,以提高群众的觉悟,推进工作。”[8]

政治课为主、文化课为辅是冬学的基本原则,即“明理第一,识字第二”。《晋察冀边委会制发本年度冬学教育实施大纲》明确规定:“各种课程的百分比,政治课占百分之三十,识字课占百分之十四,常识课占百分之十五,组织课占百分之十五,唱歌不占正课时间。特别地区只上政治课……识字在政治课中附带进行。”“不在民校规定年龄的群众,一律进行政治教育(残疾有病,或有特殊情形者除外)。在冬学上政治课时,不入学的男女,都应到校听政治课。”[7]2为此,晋绥边区行署每年免费向各冬学发放10本政治课教材,以保证政治课的正常进行。“为此责成必须县区各系统干部亲自动手,担任冬学义务的政治教员,使时事教育真正贯彻到广大群众中去。”[9]

冬学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反对采取强制处罚的办法。沙沟冬学初办时,群众不感兴趣,即使教员挨家挨户地动员,也没什么成效。调查中,教员发现群众感兴趣的事情是减租减息、反贪污,关心减租减息从哪一年减、减多少以及怎样减,因此,教员暂时不再强调冬学这个名字,而是去动员群众来听减租法令,每天晚上研究的都是大家感兴趣的减租、土地、公粮等问题。由于看到冬学里讨论的问题都是和自己利益有关的,慢慢地经常来冬学听课的人数由五六十人增加到九十多人,并且一到上课的时间,群众不等教员去叫就早早地来上冬学。群众说:“上冬学能知道政策法令,这样的冬学愿意上”。甚至有的老婆婆说:“冬学里讲公粮哩!不是识字,去听听吧。”[6]

在教学形式上,冬学强调与群众的经验、习惯相结合。秧歌是山西民众喜爱的一种娱乐活动,为此,各地冬学在开展群众教育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这种传统形式,寓教于乐,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保德县全县32个行政村,1941年在冬学中共办起了33个秧歌队(其中有联合秧歌队,一队包括几个村),参加的人数有1149人,其中男子878人,妇女271人。在晋西北,由二中学生组织的176座冬学办起了107个秧歌队,参加的人有2684人[10]。太行区一、二、三、六专区15个县1944年共有农村剧团607个,秧歌队700个[11]。秧歌、道情、高桥、旱船等娱乐形式,都装进了新的内容,在群众教育中起了很大作用。

冬学教学内容以帮助群众解决切身问题为主,解决的问题涉及婚姻、家庭、反盗窃、租佃纠纷、减租等民众日常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仅1944年保德89座冬学就解决问题1089件。

据统计,1944年太岳区沁源、沁县、屯留、长子、安泽、霍县、灵石7县参加冬学人数为12981人[12];太行区36个县共开办冬学5790座,其中以林县、武乡最多,林县有424座,武乡有410座。所有各县中,左权冬学最普及,几乎达到一个村子一座冬学的水平[11]。晋绥边区的一、二、三、六、八和塞北区共办冬学2281处,冬学学生为132820人[13]。通过冬学的开展,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克服了乍看起来难以超越的困难过程中,“共产党最终完成了将这种潜力(只是许多可能性之一)转化为行动的伟大壮举。”[14]更为重要的是,冬学教育中涌现的大批积极分子,又以干部的身份充实了基层政权,既弥补了根据地基层干部的不足,又把中共政策有效传达到乡村,从而实现了中共对乡村的全面控制。

## 二、根据地新权力阶层的生成

### (一)新权力阶层的生成方式

1. 改造旧干部

根据地新政权建立初期,一般村级干部文化程度低,“政治水准虽经过提高,但还是不够,”[15]因而,各类干部成为冬学的主要教育对象。晋绥边区在《冬学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冬学主要对象是劳动英雄、生产队长、变工组长、纺织组长、合作社积极分子、民兵及村干部等。”[7]162 晋冀鲁豫的太岳区规定,冬学教育对象主要以村干部(村闾邻长、民众团体委员、小组长、民兵队长、自卫队长、指导员、合作社主任等)、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及有组织的(工、农、青、妇、合作社)群众为主[7]206。1941 年,根据晋绥边区二分区对 87 座冬学的统计,上冬学的干部、劳英、积极分子达 1398[10] 人。1942 年,神池 31 座冬学有各类干部、会员 1549 人。

**表 1　1941 年晋绥边区二分区 87 座冬学统计**

| | 保德 | 河曲 | 岢岚 | 五寨 | 神池 | 合计 |
|---|---|---|---|---|---|---|
| 冬学 | 29 | 15 | 25 | 19 | 8 | 87 |
| 村干部 | 188 | 106 | 372 | 262 | 60 | 988 |
| 劳英 | 7 | 16 | 28 | 13 | 9 | 73 |
| 积极分子 | 72 | 71 | 57 | 37 | | 237 |
| 备考 | 河曲积极分子包括在村干部内。 | | | | | |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 晋绥边区第二分区一九四四年冬学工作总结材料. A27—1—5—4. 山西省档案馆藏.

冬学有效地提高了乡村干部的政治素养和文化水平。神池县利民寨民兵自卫队中队长,以往贷款时总是先给自己分配,导致群众意见很大。冬学中,教员积极帮助其反省和克服了缺点;该村村长经过学习以后,不仅工作能力有了提高,而且工作更加积极,表现出"不但要工作,还想到区上工作"的态度[7]168。神池北辛庄队长过去在工作中徇私情,他在冬学学习后说:“冬学是要提高群众的,自己的作风不改,吃不开。”[10]左权县冬学结合民主运动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教育干部进行自我反省,纠正了干部中存在不民主作风,增加了群众与干部的团结[16]。临南县歧道村农会干部刘锦长违反政策无理回赎地主的二亩水地,并给提意见的群众扣上特务的帽子进行斗争,在冬学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后,群众情绪逐步高涨[17]。静乐县第三区 52 个自然村干部参加冬学后,工作作风有了很大改变。一位村干部说:“今天我不上冬学,明天工作就没主意。”[18]而某干部在儿子牺牲后说:“儿子死了算什么,一个人应当为群众服务,不应只给儿子服务。”[19]离石仁家山村主任薛恒孟过去工作态度粗暴,对给他提意见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在征公粮时,私自多加产量。在冬学里反省后,群众说:“咱们的主任进步了,自反省以来,态度变好了。”[10]宁武黄土坡村主任张二小违反政策随意派群众给自己的小舅子背柴,引起群众不满。冬学教员张昌儒对他进行多次说服教育后,工作作风有了明显改变[13]。

2. 培养新干部

冬学学员根据表现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积极分子主要是由青年人构成,是冬学的骨干力量。青年人不仅自己学习热情高,而且乐于帮助其他人,在冬学学习上能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遵守时间,讨论踊跃,既勇于自我批评又敢于不顾情面地批评别人,所以被群众称为冬学模范。而广大中年人甚至一部分老年人保守性强,在冬学中表现一般,可以看作是冬学的中间分子。这些人不关心别人,只注重和关心自己的学习和利益,态度温和不激进。中间分子在冬学中占到很大比例。最后一部分主要是一些老年人,因思想较为保守,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差,不易变通,对冬学不喜欢不支持。在三类人群中,青年人是冬学依靠的主要力量,也是冬

学选拔干部的主要后备力量。冬学中涌现的积极分子,被根据地政府选拔到冬学教员和各级基层政权的行政、生产、民兵工作岗位上。

1944年,神池县利民寨冬学培养了1个行政村干部、1个小学教员和7个自然村干部[7]168。根据河曲、保德等五县84个冬学统计,当年共培养、提拔各类干部193个,其中抗联干部41个,行政干部21个,生产干部53个,民兵干部42个,小学教员36个[7]170。在1945年冬学中,五寨县培养生产干部55名,抗联干部49名,行政干部45名,民兵干部47名,教员31名,积极分子127名[20],保德县培养了1733名干部,为边区各级政府选拔453名干部。在冬学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乡村干部,逐渐成为根据地社会新兴的权力阶层。

**表2 保德县1945年冬学培养、选拔干部统计表**

| 冬学数量 | | 抗联干部 | | 行政干部 | | 生产干部 | | 民兵干部 | | 教员 | | 积极分子 | | 合计 | |
|---|---|---|---|---|---|---|---|---|---|---|---|---|---|---|---|
| | | 培养 | 选拔 | 培养 | 选拔 | 培养 | 选拔 | 培养 | 选拔 | 培养 | 选拔 | 培养 | 选拔 | 培养 | 选拔 |
| 一区 | 22 | 15 | 7 | 17 | 6 | 7 | 5 | 30 | 16 | 2 | 95 | 109 | 1 | 180 | 130 |
| 二区 | 21 | 17 | 8 | 17 | 7 | 21 | 13 | 12 | 15 | 4 | 774 | 201 | | 283 | 117 |
| 三区 | 18 | 3 | 7 | 28 | 9 | 5 | 11 | 2 | 16 | | 118 | 118 | | 156 | 161 |
| 四区 | 20 | 25 | 13 | 16 | 11 | | 2 | 13 | 12 | 3 | 5 | 50 | 2 | 114 | 65 |
| 合计 | 81 | 60 | 35 | 58 | 33 | 33 | 31 | 57 | 59 | 9 | 292 | 485 | 3 | 1 733 | 453 |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 保德县冬学工作总结. A137—1—19—8. 山西省档案馆藏.

### (二)新权力阶层的阶层特征

1. 良好的政治出身

作为乡村社会新的权力阶层,冬学中培养起来的贫雇农干部与传统地方精英不同的是,他们不是依靠经济资源与声望发展起来的,而是基于良好的政治出身,对革命的热情和忠诚。太行区桥上村新选拔的9名干部中,贫雇农出身的有3名,分别是村农会主任冯聚山(贫农)、公安员武根舒(雇农)和武委会主任李羊群(贫农);中农出身者有6名,其中抗勤贾二则为富裕中农。9名干部中7人以种地为业,另2人以放牛和赶牲口为生[21]。岚县东土峪村在冬学中改组了农会,李春芬等9人因成分及表现不好被开除,贫农李丑则、李丑银、郭富银依靠良好的政治出身和积极表现,被选为农会常委和小组长[22]。岚县南关冬学选出农会秘书、常委均为贫雇农。其中农会秘书刘四毛曾经给地主做苦力,在冬学中表现积极,领导群众发展生产被评为劳模[23]。在浑源二区下观音堂村,冬学中先后有7名贫雇农入党,贫雇农在全村党员中占到68%,中农占16%[24]。新权力阶层的良好政治出身,保证了政权的群众基础和党的核心领导。而先天的地缘基础,也使新权力阶层比外来干部更清楚民众的需求、更易于融于地方社会中,也更具有号召力。

2. 个人品德

"杨柳叶儿青,杨柳叶儿长,我们要选个好村长,能吃苦能耐劳,又积极又坚强,办事公平十六两,不选那些活套鬼,不选白眼黑心狼。"从这首根据地广为流传的民谣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品格在新权力阶层生成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因此,"老实本分、能为群众办事"是新权力阶层必备的特征。孔河沟佃户马留头,因冬学表现积极被选为变工队队长。他认真贯彻冬学指示,把冬学与冬季工作结合起来,组织全村开展冬季纺织,纺车数量从一架发展到二十几架,并建起了运输队与合作社,解决了全村冬天的烧火问题和用盐困难。在拥军工作上能发扬民主,获得了群众的拥护[25]。鱼眷岭村干部组织煤工开采废弃的煤窑,不仅解决了煤工的生活问题,使煤窑发展起来,而且解决了全村的烧煤问题,还使每户节省了500元农币,群众非满意[18]。桥上村郭贵轩、冯聚山等在冬学中表现积极,一心为群众谋利办事,被选为干部[21]。保德县冀家茆村、岢岚梁家会水峪贯、神池南砂城等地的冬学教员,因积极为群众服务,有的被群众选为村长[10]。相反,哪些不为群众办事的干

部,被群众提出撤换,北辛庄富农闫长高向山被农民要求撤换[26]。边区“高平、陵川等县的民众,曾集合数千人,跋涉山川到长治专署递交请愿书,要求撤换不法县长刘涵森”[27]。

## 三、新权力阶层与根据地社会权力转移

### (一)传统乡村政治权力结构

抗战以前,地主富农掌握着乡村政权,担任要职的多是“士绅或有钱有势的人”[28],许多地主恶霸更是长期担任村长、副村长[22],一些地区的“地主恶霸与隐藏的特务分子利用哥老会,一贯以统治地位恫吓群众,为敌办事,并利用其经济上的优势,无情的剥削群众”[29]。在晋城天水岭村,抗战前由七户当权的恶霸地主组成一个高利贷组织“同太会”。村民小根借用同太会三斗豆子,因干粮食延误了交粮期限,被同太会强行夺取了他家赖以生活的四亩好地[30]。太行区桥上村、王家庄等村抗战前基层政权调查显示,村长、副村长等职务长期被恶霸地主掌握。

地主政治上的强势地位依赖于经济优势和文化垄断。“静乐县有一个穷人,一个富人,发生纠纷,原本是穷人有理,但是在打官司的时候,富人花钱和官员打通关系,结果审判的结果却是穷人败诉。”地主雄厚的经济基础,便利了对权力的控制。同时贫雇农文化上的缺失,使“迷信成为地主维持统治的一种工具。如在宁武县,有一个地主,放出的债有些收不回来,最后,地主就想了一个办法,当时正好家中有一匹马刚下了小马驹,地主就向老百姓宣传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马是过去一个欠他账的人变的,就因为没有还钱,结果转世变成了马来还债。并且说;那些欠他债的人如果不还债,来世一定变成什么来还债。结果,那些欠债的人就都想办法还了债”[29]。根据太行区统计,1939 年太行区的 9 个区文盲为 95% -98%[11],在晋绥边区的静宁县,文盲占全县总人口的 90% 以上[31]。贫雇农文化、经济上的劣势,导致了乡村话语权的丧失。

### (二)根据地权力结构重构

冬学之后,根据地政治构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震动。长久以来传统乡村社会中延续、发展的道统和社会秩序轰然崩溃,地主权威打到,地主与贫雇农地位发生位移,乡土草根精英迅速崛起。1941 年晋绥边区 11 个县 55 个行政村的村选代表中有 44% 是中农,38% 是贫农、雇农和农村工人,16% 是地主富农;村长中 32% 是中农,53% 是贫农,14% 是地主富农。在临县四区后甘泉行政村的各类组织中,中农占到了 21.9%,贫农为 32.4%,佃农为 16.8%,三者共计占到 71.1%[32]。在当年晋绥边区的选举中,出身于中农、贫农、佃农的候选人,也占到了候选人的绝对多数。根据地社会新兴的权力阶层,成为乡村基层政权的主要构成,从而形成了新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威。在新兴社会精英中,值得注意的是妇女的崛起。1940 年后,妇女参政已经是边区社会习以为常的现象。1941 年前,由晋西北各地进入政府工作的妇女干部多达 180 多人[33],女村长、女民兵队长等在根据地更为普遍。

**表 3　1941 年后甘泉行政村各组织调查表**

| | 地 | 富 | 中 | 贫 | 佃 | 雇 | | | |
|---|---|---|---|---|---|---|---|---|---|
| 农会 | 1 | 10 | 33 | 74 | 42 | 8 | | | |
| 工会 | 2 | 8 | 3 | 10 | 4 | 7 | 1 | | |
| 青救会 | 6 | 12 | 48 | 51 | 30 | 2 | 12 | 11 | |
| 妇救会 | 6 | 21 | 49 | 67 | 26 | 6 | 11 | 23 | 7 |
| 自卫队 | 6 | 26 | 53 | 70 | 45 | 9 | 15 | 28 | 2 |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 临县县政府关于村选工作的指示、会议记录、总结. 62—2—2. 山西省档案馆藏.

冬学之后,新的乡村精英阶层构成了根据地基层干部的主干,党的“任何工作都要通过区村干部,才能实现”。经过他们,党的各种方针政策得以传达、贯彻,从而领导和团结全体农民投入到抗

敌斗争、发展生产、保家卫国的运动中。“在对敌斗争中,他们领导群众进行过反扫荡、转移、建设人民武装和坚持游击战争,他们领导群众进行过扩兵、优抗、屯集公粮、完成合理负担的工作;他们领导群众进行过打蝗、救灾、渡过荒年,以及大生产运动。”[34]统计,仅在1940年的两个月中,全晋西北地区共集粮90426石,献金1810625元,扩兵15885名,做军鞋118441双[35]。兴县献出粮食28000多石(计420多万公斤),元宝370多个(合白银11300多两),银元57000元,各种金银首饰器皿100公斤,黄金27两,法币15万元,以及大量布匹、牲畜等。百团大战中,太行二分区出动民兵、自卫队万余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新的乡村干部不仅推动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而且成为日后南下干部的重要来源之一,仅阳城县四区1947年9月底即有22名村干部踊跃报名南下[36]。

## 四、结 语

根据地新权力阶层生成过程中,中共以外部力量促使根据地社会内部各阶层的位移。传统权力阶层的落沉与新权力阶层的上升,反映了政治革命背景下乡村社会权力的转移渠道。尤为重要的是,中共以教育革命的路径完成了革命的教育。经历革命教育洗礼的民众积极参与了新权力阶层生成的全过程。因此,根据地社会新权力阶层的生成是外力和内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正因如此,新权力阶层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样,中共在进行民众教育的同时,也完成了基层政权的本土化,从而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党内著名理论家艾思奇曾经指出,共产党有两种政治任务,“一种是宣传和教育任务,另一种是组织任务。”[37]从这一视角看,冬学无疑是中共政治革命成功的最有效路径之一。

**参考文献:**

[1] 聂荣臻. 聂荣臻军事文选[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2] 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M].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87:20.
[3] 彭真. 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13-14.
[4] 张焕庭. 教育辞典[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195.
[5] 汾阳专区的冬学运动[A]. 山西省档案馆:C61-5-2.
[6] 沙沟村冬学试验总结[A]. 山西省档案馆:A152-1-86-3.
[7]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第2册(下)[G].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
[8] 太岳行署关于冬学运动的指示[N]. 新华日报(太岳版). 1945-11-15.
[9] 左权县三二年冬学初步报告[A]. 山西省档案馆:A166-1-33-4.
[10] 晋绥边区第二分区一九四四年冬学工作总结材料[A]. 山西省档案馆:A27-1-5-4.
[11] 太行区教育概况[A]. 山西省档案馆:G3-40.
[12] 太岳一、二专区各县冬学概况表[A]. 山西省档案馆:71-4-31-10.
[13] 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民教处. 一九四四年冬学运动总结[A]. 山西省档案馆:A90-3-27-2.
[14]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335-336.
[15] 关于一九四五年冬学工作的指示[A]. 山西省档案馆: A162-2-59-3.
[16] 左权县一九四四年度冬学总结[A]. 山西省档案馆:A166-1-33-6.
[17] 歧道(临南)冬学概况[A]. 山西省档案馆:A147-1-28-8.
[18] 静乐县第三区冬学材料[A]. 山西省档案馆:A140-1-28-3.
[19] 四五年兴县冬学教员训练总结[A]. 山西省档案馆:A141-1-26-1.
[20] 五寨县1945年冬学工作总结[A]. 山西省档案馆:A138-1-32-6.
[21] 桥上村历年来社教工作工作总结[A]. 山西省档案馆:A218-1-23.
[22] 岚县年关娱乐活动、冬学转变、分配土地、整理农会总结材料[A]. 山西省档案馆:A139-1-23-1.

[23] 岚县解放以来的发展概况与冬学总结[A]. 山西省档案馆:A139 -1 -23 -3.
[24] 浑源二区下观音堂典型调查材料[A]. 山西省档案馆:A134 -1 -49 -2.
[25] 静乐县冬学总结[A]. 山西省档案馆:A140 -1 -6 -1.
[26] 神池县冬学工作总结[A]. 山西省档案馆:A138 -1 -10 -2.
[27] 克寒. 坚持华北抗战枢纽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三)[J]. 群众,1939(2).
[28] 晋西北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Ⅳ -村选[A]. 山西省档案馆:A22 -1 -4 -1.
[29] 宁武县冬学训练班工作总结[A]. 山西省档案馆:A138 -1 -25 -1.
[30] 朱襄,林韦. "揭皮"——晋城天水岭群众翻身记[N]. 人民日报,1946 -06 -20.
[31] 一九四一年静宁县教育工作总结[A]. 山西省档案馆:A140 -1 -26 -1.
[32] 临县县政府关于村选工作的指示、会议记录、总结[A]. 临县档案馆:62 -2 -2.
[33]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G].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322.
[34] 向区村干部致敬 立功表模、改善作风、干群团结[N]. 人民日报,1947 -04 -23.
[35] 神池县冬学工作总结[A]. 山西省档案馆:A138 -1 -10 -2.
[36] 大批干部踊跃南征 帮助中原农民翻身[N]. 人民日报,1947 -10 -17.
[37]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9:311.

# Dongxue and Revolutionary Base in Shanxi Rural New Power Generation(1937—1945)

GUO Xia-yun
(*Institute of Marxism*,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China*)

**Abstract**: In the great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background, the new power class in the revolutionary base has been ignored by researchers. As the rural new right class, Dongxue provided enlightenment, awakening and growing environment for revolutionary thoughts. The formation of new rural power class, promot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revolutionary bases and mad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hieve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rural society, and changed organizational vacuum of the state power in the rural society, and provided the necessary cadre reserve for the revolution victory.

**Key Words**: Dongxue; revolutionary base in Shanxi; rural society; power generation